

# 苏州市人口郊区化作用机制研究

陈 浮

**【提要】** 本文根据苏州城市区域空间构造特征,运用 Hall 城市人口变动模式对人口郊区化问题进行判断和特征分析;从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等方面,指出中国城市人口郊区化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人口郊区化动力和作用机制存在着差异。最后,具体阐明 80、90 年代苏州市人口郊区化动力机制的变迁。

**【作者】** 陈 浮,南京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博士研究生。

## 1. 引言

郊区化(suburbanization)最初出现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在美国城市化进程中,以向心集聚为特征的初期城市化之后,城市人口与各项职能活动向郊区迁移的过程。国内学者对郊区化的理解,大致可归纳为两类,即广义与狭义的郊区化(柴彦威,1995)。广义郊区化是指城市周边的乡村地域在城市核心区影响下,城市性因素增加,农村性因素减少,在景观上和功能上向城市型地域转化的过程。强调城市本身向周边区域扩张,城市核心区与边缘区的相互关系并不是考察的重点,即不论郊区的地域转化是否由城市核心区人口与功能要素外流所导致,都将其视为郊区化。与此相对的狭义郊区化则侧重于讨论城市核心区人口与功能要素向郊区外迁,或者至少应当以城市核心区是否相对于郊区呈下降势态来界定。广义郊区化实际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在城市化进程的各个发展阶段都存在的现象,但是狭义郊区化一般被认为是在城市化水平较高阶段出现。中国城市化总体水平并不高(1995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 28.85%),然而 80 年代以来城市化进程迅速。因此,本文是在狭义郊区化基础之上研究中国城市人口郊区化问题。

再者,人口是城市发展进程中最为活跃的因素。人口的空间变动是城市空间变化的指示器。发达国家城市郊区化也是以人口与居住郊区化为先导,继之以产业与日常生活空间郊区化。因此,本文将以城市人口的空间变动为主题讨论人口郊区化问题<sup>①</sup>。

## 2. 苏州城市区域空间构造

苏州市区在行政上包括沧浪区、平江区、金阊区和郊区,1990 年下辖 22 个街道和 4 乡 1 镇,人口 88.27 万,面积 178.12 平方公里。本文以苏州市 1982 年和 1990 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为主评论苏州市区人口的空间变动,同时辅以 1994 年人口统计年报数据对人口空间变动的最新动态进行考察。

人口变动的分析总是以一定地域范围为对象的。人口郊区化分析则应建立在对城市地域

<sup>①</sup> 本文以 Hall 城市人口变动模式分析苏州核心区与郊区的人口及其变动特征。

空间进行适当划分的基础之上。考虑资料的可得性和分析的可行性，本文以中国城市基层行政机构街道办事处（郊区也包括乡镇）所辖范围为基本单元进行地域空间划分。

城市地域既是空间上的实体，又是动态演化过程的时间性扩展。因此，城市地域空间划分可按空间位置关系，亦可按形式发展序列进行。苏州市街道现今所辖范围均是不同历史时期发展起来的，为不对基本空间单元进行分割，依据苏州城市各空间单元的相互位置关系，将市辖各区地域范围划分为三个空间层次：

边缘乡镇，苏州市郊区 1994 年以前所辖 4 乡 1 镇和 1 街道的地域范围，大体上是包围苏州城市建成区的地域。

边缘地区，处于边缘乡镇内缘的 9 个街道，街道或者整个或者部分是改革开放以来建设的。包括沧浪区吴门桥、胥江、葑门；平江区娄门、北寺塔；金阊区留园、山塘、彩香、三元。

核心城区，处于边缘城区包围之中的 12 个街道，均是旧城区。包括沧浪区公园、府前、南门、双塔；平江区平江路、观前、皮市街、东北街；金阊区石路、中街路（1994 年合并入金门）、金门、桃坞。

3. 苏州人口郊区化判断与特征分析

3.1 人口变化的动态分析

基于上述的地域空间划分，对苏州市 1982 ~ 1990 年的人口变动数据进行了整理分析（见表 1）。

表 1 1982 ~ 1990 年苏州市人口空间变动及特征

空间层次	1982 年	1990 年	净增人数	净增 %	年均增 %	户均人数	非常住人口 %
核心城区	369 968	336 955	- 33 013	- 8.92	- 1.16	2.90	5.49
边缘城区	187 206	327 852	140 646	75.13	7.26	3.10	6.17
边缘乡镇	185 200	209 768	24 568	13.27	1.57	3.95	7.68
边缘区合计	372 406	537 620	165 214	44.36	4.70	3.51	7.12
市区合计	751 361	882 691	131 330	17.48	2.03	3.17	6.47

注：市区合计数中包括了公安局系统集体户、阊门和盘胥水上派出所 3 个普查单元的人口，本文对苏州城市地域空间的划分不包括这 3 个单元，因此市区合计数与 3 个空间层次数据相加的结果有出入。  
资料来源：1982、1990 年人口普查数据。

由表 1 可见，1982 ~ 1990 年间，苏州市区人口仍呈上升趋势，年平均增长率为 2.03%，而同期全市域总人口年平均增幅仅为 0.85%，市辖各县（市）人口年均增长率都未超过 1%。因此，从较大的区域范围来看，苏州市的人口变动仍具有城市指向的集聚趋势。

在市区人口增长的同时，苏州核心城区的人口却出现了明显的负增长，而边缘区的人口增长则达 44.36%，其中边缘城区的增长高达 75.13%。根据上述的人口变动模式，这种人口变动已属于绝对分散型。这一时期苏州城市地域各单元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均为负值且控制在 10% 上下，因而上述人口变动显然系迁移导致。由此看来，在 80 年代的苏州，以核心区人口外迁和边缘区人口巨增为特征的人口郊区化已经发生。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边缘城区的人口增长无论是绝对数字，还是增长率都大大高于边缘乡镇。由此可以推断，苏州城市人口郊区化的空间指向仍然是紧邻原有核心区的边缘城

表 2 1982 ~ 1990 年苏州城市  
分街道人口变动与特征

地域单元		净增 人数	净增 %	年均 增 %	1990 年户 均人数	非常住 人口 %	
核 心 城 区	沧浪区	公园	31	0.10	0.01	2.95	6.11
	府前	- 5 493	- 15.50	- 2.08	2.77	4.33	
	南门	8 967	39.91	4.29	3.11	8.31	
	双塔	5 191	17.11	1.99	2.96	4.31	
	平江区	平江路	- 5 737	- 16.99	- 2.30	2.87	5.06
	观前	- 7 114	- 23.40	- 3.28	2.79	4.08	
	皮市街	- 8 616	- 24.56	- 3.46	2.87	5.16	
	东北街	- 2 380	- 8.74	- 1.14	2.96	4.19	
	金阊区	石路	- 5 900	- 16.84	- 2.28	2.84	6.55
	中街路	- 5 938	- 17.95	- 2.44	2.83	4.57	
	金门	- 2 952	- 13.33	- 1.77	2.87	5.22	
	桃坞	- 3 072	- 8.72	- 1.13	2.91	5.10	
边 缘 城 区	沧浪区	胥江	6 645	17.90	2.08	3.07	8.65
	吴门桥	33 860	113.37	9.94	3.15	6.45	
	葑门	11 738	92.60	8.50	3.12	6.69	
	平江区	北寺塔	2 645	9.16	1.10	3.06	9.06
	娄门	27 625	166.93	13.06	3.09	2.32	
	留园	10 695	33.61	3.69	3.04	5.21	
	金阊区	山塘	287	1.18	0.14	2.91	6.60
	彩香	34 012	819.76	31.97	3.24	5.39	
	三元	13 499	706.75	29.82	3.12	5.99	
边 缘 乡 镇	郊区	白洋湾	2 693	—	—	3.99	25.47
		浒墅关镇	790	1.06	0.13	3.65	4.88
		娄葑乡	5 790	15.40	1.81	4.16	7.55
		横塘乡	6 686	18.97	2.20	4.10	9.80
		长青乡	1 310	6.48	0.79	4.07	7.20
		虎丘乡	7 299	42.16	4.50	4.22	12.90

资料来源：根据《江苏省苏州市第四次人口普查手工汇总资料》计算整理。

在的空间层次是基本一致的。同一空间层次内部人口变动也存在较大差异，其原因还需根据具体情况作进一步分析。

### 3.2 静态特征

除了以人口迁移为中心的动态变化之外，城市地域不同空间层次的静态人口特征也能为提示人口郊区化的特征提供帮助。下面分析一下苏州家庭类型和人口结构在城市空间上的分布差异。

#### 3.2.1 家庭类型

首先考察家庭规模类型，这可以直接通过家庭户均人数反映出来。根据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整理的的数据（见表 1、表 2），苏州城市家庭规模类型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核心城区的户均人数最低，仅为 2.90，边缘城区稍高（3.10），边缘乡镇（3.95）与边缘城区的差异则十分明显。

区，而不是更远一些的边缘乡镇。

另外，从市区总人口增长这一事实及其高于自然增长率的幅度（年平均 2.03%），可以看出，除了核心区人口迁出之外，市区以外人口的迁入也是导致边缘区人口巨增的因素。

下面进一步对各街道的人口变动差异作出分析（见表 2）。

核心城区：核心城区中属于平江区和金阊区的各街道人口均为负增长，其中包括核心城区中负增长幅度最大的观前街道（-23.40%）和皮市街街道（-24.56%）。而属于沧浪区的 4 个街道中，府前街道为负增长，公园街道年均增长仅 0.01%，低于其自然增长率，也属于迁出型地区，另两个街道则呈现较高的正增长（南门街道 39.91% 和双塔街道 17.11%）。

边缘城区：边缘城区中人口增长幅度最高的是位于西郊的以新居住区为主的彩香街道（819.76%）和三元街道（706.75%）。增幅较高的其它街道是位于市区南端与吴县接界的吴门桥街道（113.37%），位于东郊的娄门街道（116.93%）和葑门街道（92.60%）。增幅最小的是位于西北郊的山塘街道，年均增幅仅为 0.14%，属于迁出型地区。

边缘乡镇：边缘乡镇中白洋湾为 80 年代新组建的街道。除浒墅关镇（原属吴县市）和长青乡人口增幅较低外，其余 3 乡增幅均高于 10%，其中虎丘增幅达 42.16%。

可以看出，各街道的人口变动趋势与其所

分街道看,核心城区除南门街道的户均人数为 3.11 外,其它街道均在 3 以下,变动范围在 2.77 ~ 2.96 之间。边缘城区除山塘街道为 2.91 外,其它街道均在 3 以上,变动范围在 3.04 ~ 3.24 之间。边缘乡镇除浒墅关镇略低 (3.65),其它 4 个乡均达 4 以上。

户均人数亦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家庭的构成类型。边缘乡镇高户均人口说明该区域中由较多成员组成的传统的主干家庭所占的比例较高。核心城区与边缘城区户均 3 人左右,说明两者都是核心家庭占优势,然而两者又存在差异,则可能是由于边缘城区中四口之家(以有两个未婚子女的核心家庭为典型)比例相对较高,而核心城区单身及双人家庭相对较多。

边缘乡镇较大的家庭规模和传统的家庭构成类型是因为它相对于城区而言具有较多的农村性因素,受传统农业社会的文化心态影响较大,另外宽裕的住房也为大型家庭的存在提供了条件。

### 3.2.2 人口结构

反映人口结构的指标很多,如性别比例、年龄结构、文化结构、职业结构等。本节讨论苏州市无本地常住户籍人口的分布情况。无本地常住户籍人口采用第四次人口普查登记的第(2)、(3)、(4)项相加,大体上反映了外来人口的情况(见表 1、表 2)。

从三个空间层次的差异来看,无本地常住户籍人口的比例也呈内低外高的分布形态。边缘城区比例比核心城区高 0.68%,边缘乡镇与边缘城区的差异则更大一些 (1.51%)。

但在同一空间层次内部,各街道无本地常住户籍人口比例则存在较大差异。如核心城区中的南门街道的这一比例高达 8.5%,高出核心城区整体值近 3 个百分点;而整体值高达 6.17%的边缘城区中则有娄门街道例外,该街道无常住户籍人口比例为 2.32%,在各空间单元中是最低的。

上述提到外来人口是引起苏州边缘区人口巨增的因素之一。这里我们看到了无常住户籍人口在边缘区尤其是边缘乡镇的集聚,无疑是上述结论的佐证。外来人口之所以更偏好边缘乡镇以及他们在各空间单元分布的差异,与其自身的效用分析是分不开的,同时也与管理体制、政策的差异有关。

## 4. 苏州人口郊区化作用机制探讨

### 4.1 宏观动力与条件

本文所讨论的狭义郊区化一般被认为是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中的典型现象。因此,在考察苏州人口郊区化的原因时,将参照发达国家的人口郊区化进行对比分析。另外,人口在城市空间上的分布和变化,实际上是针对其居住地而言的。所以,本文对人口郊区化的分析将围绕对居住的分析而展开。

发达国家大城市人口郊区化的主要原因是核心区人口压力过大。人口增长超过城市容量,城市核心区居住环境变差,郊区住房面积大,建筑密度低,环境优美,因而在高收入阶层中首先产生了居住需求的郊区指向。从住宅的供给方面讲,除了受需求推动外,由于旧城改造成本高,在缺乏政府干预的情况下,房地产开发商或家庭也倾向于在郊区新建住宅。此外,交通工具的改进与交通设施的发展也为人口向郊区移居提供了便利条件。

根据初步调查研究分析,80 年代以来苏州人口郊区化在宏观上的动力和条件与发达国家城市郊区化过程既有相似又有差异。

一方面,城市住宅的长期供给短缺造成矛盾不断积累,60 年代以来城市居住建设的历

史性欠账在苏州核心区形成的居住需求强大压力一直延续到 80 年代。

与其它许多城市一样,长期以来苏州的城市发展片面强调“先生产、后生活”、“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工业用地扩展迅速,居住建设得不到重视,在建设上依附于生产性建设投资,空间上见缝插针,建筑密度不断提高,使得居住质量下降。

苏州城市建设用地从 50 年代到 1982 年扩展了 664.8 公顷,其中工业用地占了 77.5%(吴楚材等,1987)。同一时期居住用地却呈减少趋势。与此同时,苏州城市人口仍然保持增长,1982 年普查时市区人口是 1953 年的 1.5 倍。人口增长与居住建设停滞导致居住条件无法满足需求,城市核心区面临强大的居住压力。其与发达国家人口郊区化的动力有相似之处。

另一方面,80 年代苏州在原有建成区外围成片开发了大量居住区,不仅在供给量上缓解了居住压力,而且在空间上形成了住宅供给的郊区导向,使得核心城区人口向边缘区疏散。上述彩香和三元街道几乎完全由 80 年代之后新建的居住社区构成,其人口增长也显得特别突出。其它几个人口增长显著的街道,如吴门桥、娄门、葑门等也包含了大量的居住社区。

从交通条件分析,包括苏州市在内的中国大城市在 90 年代中期以前仍以公共汽车和自行车为主要交通工具,亦是苏州人口郊区化的范围局限于核心城区紧邻地域的主要原因,也是与发达国家在人口郊区化上的重要差异。根据建成区面积与出行方式等模拟计算,苏州城市活动半径 1982 年为 5.5 公里,1990 年为 6.4 公里,约为自行车半小时可达范围之内。

综上所述,城市核心区居住需求压力与居住供给郊区导向的结合,构成了苏州城市人口郊区化的宏观动力。至于二者如何结合,则要对人口郊区化的作用机制进行探讨。

## 4.2 作用机制

尽管从宏观层面上看,苏州人口郊区化的动力与发达国家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经济、社会制度及文化背景上存在很大差异。苏州本身亦有其地方特色。所以对人口郊区化动力的作用机制,特别是在特定的制度背景下行为主体活动的支配性因素及作用过程进行分析,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 4.2.1 被动的居住选择

西方国家城市中心人口郊区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个体择居行为空间指向的郊区化。在西方国家城市中,尽管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政府干预,但从根本上,住宅产权的取得是市场化的,取决于消费者和开发商之间的互动与交易。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就业是影响住宅效用的因素之一。例如特定职业所能提供的收入是否与房价相适应,居住地与就业地之间通勤成本如何等。但择居行为与就业之间并不存在依赖性关系,在一定的收入可支付其房价或房租的住宅分布空间范围内,城市居民可以自由地根据其效用分析来选择居住地。人口郊区化的宏观动力正是通过城市居民的自主择居行为来发生作用的。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中国城市居民几乎没有独立于单位之外的择居能力(吴缚龙,1992;武进,1990)。单位作为中国城市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在计划经济福利住房制度下,单位住房分配是城市居民取得住房,尤其是新建住房的主要途径。居民也因此丧失了对居住地的自主选择权力。

除上述之外,政府房管部门对所谓的“直管公房”分配也是居民取得住房的途径之一。由于住房紧缺,政府掌握着分配的主导权,居民还是缺乏自主选择的机会。政府“直管公

房”新建少，改造拆除多。苏州市住宅建筑面积中“直管公房”面积从1986年的395万平方米下降到1990年的364万平方米。因而其很难成为人口郊区化的目标。

相比之下，城市居民的住房交换似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个人意愿和选择自由，国内也有人通过对住房交换的分析研究城市人口的迁居问题（唐子来，1986）。但本人通过苏州市的实践研究认为，住房交换对苏州人口郊区化影响甚微。由于单位制管理方式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单位“自管公房”不可能加入住房交换行列，住房交换的对象主要是居民私房和“直管公房”，而且是旧有住房，即所谓“存量”。住房交换只涉及存量的调整，而不能对增量发生作用。

80年代中后期城市房地产业的兴起，尤其商品住宅的开发也为部分城市居民提供了自主选择的机会，但由于价格等方面原因，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单位分配为主导的体制。

从总体上看，在80年代苏州人口郊区化过程中，城市核心区的居住压力并不是通过城市居民主动的居住选择倾向作用于人口迁移过程，自主择居权力的丧失是人口郊区化作用机制的重要特征。

#### 4.2.2 政府作用与古城特色

苏州旧城区外围新区的开发建设是人口郊区化的动力之一，政府在新区开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政府直接参与新区的开发。主要是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如城市道路的开拓与延伸，水、电、煤气等公共设施及邮电通讯设施的建设等。另一方面，政府在宏观上对城市发展进行空间导向，这主要体现在城市总体规划的制订上，并且与苏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风景旅游城市”的特点密切相关。

80年代初制订的苏州城市总体规划主要是以保护古城风貌为出发点，集中体现了疏散古城内密集人口的思想。1986年国务院对规划的批复中即提到“要全面保护古城风貌”。在“古城新区，东城西市”总体格局指导下，苏州老城区的西侧成为重点开发的新区，在1990年以前形成了大规模连片的居住区，如彩香、三元、新庄等，以及相应的商业服务中心。由此可见，新区开发以政府为主导是苏州人口郊区化的又一重要机制。而机制得以运行的制度背景是土地所有权公有制。

西方国家城市住宅开发的基本运作过程是以民间开发公司为中心的，其住宅兴建空间选址的根本出发点是利润最大化。政府作用则随着国家不同而有很大差别，此处不深入讨论。

以上从人口迁居行为的非自主性和新区开发中强大的政府作用两个方面分析了苏州人口郊区化的作用机制以及与发达国家相异的特征，实际上也体现了中国城市社会经济生活的共性。

把握人口郊区化的作用机制是深入分析人口郊区化问题的关键。进一步分析上述的家庭类型空间分布现象可以发现，苏州家庭规模类型呈内低外高的空间分布，与北美城市家庭规模空间模型（虞蔚，1986）有着惊人的相似。如果仅从中国城市居民无自主择居权来分析似乎无法说通，实际上可以从以单位为主导的住房分配体制中得到解释。单位分配住房常常以资历、工龄等作为依据，职工随着年龄增长往往可得到较好的住房。而家庭规模亦是随成员年龄的增长而变化，因而家庭规模与住房条件之间便发生了联系。需要指出的是，苏州家庭规模的空间分异并不是居民因家庭规模变化而主动选择不同区位、不同条件住宅的结果，单位住房分配制度仍然是主导因素。

表 3 1994 年苏州市分街道人口迁移情况 人

地域		移入人数	迁出人数	净移人数	
单元					
核 心 城 区	沧浪区	公园	2 075	3 381	-1 306
		府前	1 410	3 183	-1 773
		南门	1 420	2 118	-698
		双塔	2 145	2 702	-557
	平江区	平江路	1 313	2 831	-1 518
		观前	697	4 324	-3 627
		皮市街	1 732	1 932	-200
		东北街	1 232	1 980	-748
	金阊区	石路	975	3 055	-2 080
		金门	2 623	3 561	-938
		桃坞	1 653	1 648	5
边 缘 城 区	沧浪区	胥江	2 123	2 307	-184
		吴门桥	6 789	2 371	4 418
		葑门	3 355	1 102	2 253
	平江区	北寺塔	1 931	1 565	366
		娄门	4 666	1 745	2 921
		留园	2 517	1 980	537
	金阊区	山塘	1 449	1 270	179
		彩香	2 087	2 146	-59
		三元	5 104	784	4 320
边 缘 乡 镇 区	郊 区	白洋湾	31	52	-21
		浒墅关镇	158	623	-465
		娄葑乡	102	151	-98
		横塘乡	98	212	-114
		长青乡	28	74	-46
		虎丘乡	45	152	-107

资料来源：苏州市公安局 1994 年《总人口平衡表》。

西邻苏州新区的三元、东邻工业园区的娄门、葑门，仍然保持了 80 年代的高移入，这里有边缘城区建设向深度推进的因素，也同周围三个新区的开发密切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边缘乡镇各单元在 1994 年均为负移入，由此看来，苏州人口郊区化的迁入空间范围并未进一步扩展，而是更加集中于边缘城区。

下面再讨论 90 年代以后苏州人口郊区化新的动力、条件与作用机制。

### 5.1 人口郊区化的动力

进入 90 年代以后，苏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建设格外引人注目。

在发展序列上，高新技术开发区是 80 年代的西部向大运河以西的推进与延伸，但在功能上已完全超越居住，被视为苏州城市新的生长点。在规模上，高新技术开发区规划总面积 52 平方公里，相当于苏州 1990 年建成区面积的 1.40 倍<sup>①</sup>。

苏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发展无疑为人口郊区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线索。一方面，以产业开发为主导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可能成为产业郊区化的促发动力；另一方面，以高水平的基础设

## 5. 苏州人口郊区化趋势探讨

上述对苏州人口郊区化分析是以 80 年代为时间背景，无论其现象特征，还是动力机制均与当时的宏观社会经济条件相联系。进入 90 年代以后，政府明确提出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入的转变。因此，下述试图对新时代背景下苏州人口的空间变化趋势作一些探讨。

由于资料限制，对 1990 年以后苏州人口郊区化分析只能借助人口统计年报进行。人口普查与人口统计年报的统计口径不一致，二者不具备可比性，所以这里采用 1994 年人口迁移数据进行分析（见表 3）。

对上述数据分析可以看到苏州人口郊区化仍呈继续发展之势，即仍然是核心城区人口迁出，边缘城区人口移入。

核心城区中人口外移量最大的是观前、石路两街道，也是苏州著名的商业中心。显示出高回报率的零售商业向核心区其它类型用地发生置换，也是级差地租规律在土地有偿使用改革后的资产价值体现。此外，迁出型地域单元有所增加，不仅核心城区中的南门和双塔变为迁出型地域，边缘城区中的胥江也是负移入。

在边缘城区中，南接吴县新区的吴门桥、

<sup>①</sup> 《苏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规划报告》，1996 年。

施和生活服务设施为特征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可能成为人口郊区化进一步扩展的动力。另外,从区域范围来看,周边开发区亦对苏州市人口、生产要素和城市功能变迁发生作用。

## 5.2 人口郊区化的空间尺度

80年代苏州人口郊区化主要以紧邻核心城区地带为空间指向,与发达国家人口郊区化广阔的空间尺度存在明显差异。主要原因是交通条件制约。发达国家小汽车的广泛使用以及地铁、高速交通设施大大降低了郊区与核心城区之间的通勤成本,为人口郊区化的空间扩散提供必要条件。

苏州人口郊区化是否存在更广阔的郊区空间趋势?近几年在中国城市出现小汽车热,城市基础设施和高速交通发展迅速,但从各方面情况分析,小汽车真正进入普通市民家庭尚待时间。所以,苏州人口郊区化在未来向更广阔空间推进是有可能的,但受特殊国情的制约,推进尺度在短时间内似乎不会有质的飞跃。

## 5.3 人口郊区化的作用机制

90年代中国社会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步伐明显加快,对于城市人口的空间变化而言,各种动力的作用机制也随着制度变革出现了新的变化。这里从居住选择机制方面作一些分析。

随着城市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化,城市居民逐步摆脱在居住上对单位的依附,开始具有相对自由的择居权力。福利型低租金住房分配制度逐步解体,住房商品化和城市房地产业的兴起打破了单位对新建住宅供给的垄断,使得自由择居成为影响郊区化的因素。同时,住房交换和产权交易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也为居住流动性的提高提供了条件。包括居住地内的社会功能从单位中分离是必然的趋势,择居行为的个人化及其依赖条件的多元化将日渐成为影响城市人口空间分布的重要机制。

## 参 考 文 献

1. 柴彦威:《郊区化及其研究》,《经济地理》,1995(2)。
2. 吴楚材等:《苏锡常城市用地动态变化》,《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所集刊》,1987。
3. 吴缚龙:《中国城市社区类型及其特质》,《城市问题》,1992(5)。
4. 武进:《中国城市形态:结构、特征及其演变》,江苏科学出版社,1990。
5. 唐子来:《上海市区人口迁居问题初步研究》,《城市规划汇刊》,1986。
6. 虞蔚:《城市空间研究与规划》,《城市规划》,1986(6)。
7. 顾朝林等:《中国大城市边缘区研究》,科学出版社,1995。
8. 孔胤社:《城乡边缘带的人口空间组织》,《经济地理》,1995(2)。
9. P. Hall, The World and Europe, The Future of Urban Form, Eds. J. Brotchie, New York: Croom Helm, 1995.

(本文责任编辑:朱 萍)